

潘富恩 著

天地生一人，自足了一世。但恨人不能尽用天下之才，此其不能大治。



程颢 程颐

Cheng Hao Cheng Yi

大家精要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程颢 程颐

潘富恩 著

大家精要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代号: SK16N146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程颢 程颐 / 潘富恩著. — 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7.1

(大家精要)

ISBN 978-7-5613-8831-0

I. ①程… II. ①潘… III. ①程颢(1032-1085) — 传记 ②程颐(1033-1107) — 传记 IV. ①B244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21634号

程颢 程颐 CHENGHAO CHENGYI

潘富恩 著

责任编辑	宋媛媛
封面设计	张潇伊
出版发行	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)
网 址	http://www.snupg.com
印 制	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660mm×980mm 1/16
印 张	10
字 数	100千
版 次	2017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613-8831-0
定 价	20.00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 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: (029) 85303879 传真: (029) 85307864 85303629

丛书编委会

总 策 划：来新国 王文成

编委会主任：郭齐勇 周晓亮

编 委：来新国 陈知涯 张 彧 尹格韬 沈 众

王文成 孟淑贤 周长志 罗养毅 秦 丹

乌 琛

目 录

第1章 程颢、程颐生平 / 001

一、程颢生平 / 001

二、程颐生平 / 007

第2章 二程理学的形成 / 018

一、二程理学对儒学的继承和创新 / 018

二、二程理学对佛、道思想的吸收 / 023

第3章 二程的哲学思想 / 028

一、“天下只有一个理”的宇宙本体论 / 029

二、“天理”与“人心”的主客观关系 / 037

三、“格物穷理”的认识论方法 / 042

四、“无独有对”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/ 057

五、“物极必反”是对面转化的简朴理论 / 064

第4章 二程的政治思想 / 068

一、“古今异宜”的历史进化观 / 068

二、变革是大事，要因时制宜 / 074

三、由才德兼备的“贤能之士”在位掌权 / 084

四、治理社会“须立善法” / 090

第5章 二程的经济思想 / 096

一、“以食为本”，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 / 096

二、“渔猎有节”，保护自然资源 / 100

三、发展农业，主张“耕者有其田” / 103

第6章 变化气质的道德修养论 / 111

一、“变化气质”说明人的禀性可移 / 112

二、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是二程伦理道德观的核心 / 114

第7章 二程的教育思想 / 122

一、读书为了明白道理 / 123

二、教育以培养有力人才为目的 / 129

三、对不同的教育对象要“因材施教” / 131

四、学习重在“自得” / 133

五、深思为学问之源 / 135

六、对佛教和道家思想的批判和汲取 / 139

结束语 / 145

附录

年谱 / 150

二程著作简介 / 153

第 1 章

程颢、程颐生平

程颢、程颐兄弟创建的学说，以“理”为其最高哲学范畴，故名“理学”。又因这一学说是程颢、程颐在洛阳从事学术活动时所创建，所以又称作“洛学”。

二程是理学的创建者。尔后，朱熹在二程理学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学说，最后形成了完整的程朱理学体系。这一体系一经形成，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。它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影响巨大。

一、程颢生平

程颢，字伯淳，河南洛阳人。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（1032），出身官宦世家。宋朝开国时，程颢的高祖程羽就受到宋太祖赵匡胤的重用。太祖去世后，程羽又受到太宗赵光义、真宗赵恒的重用，官至礼部尚书，赐第京师。程颢的曾祖程希振官至尚书虞部员外郎。祖父程逵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。父亲程

珣，仁宗天圣年以世家子补郊社斋郎。他做了几十年的地方及中央官员，神宗熙宁年间致仕，封永年伯。程珣任黄陂（今湖北黄陂）县尉时，程颢就出生在父亲的任所。对于程颢的生平，我们从读书、为官和从事学术活动三个方面进行介绍。

读书明理

程颢很早就开始了读书认字。他少时运气好，有机会得到名师的指教。

程珣为虔州兴国县令时，结识了后来被人尊为道学开山之祖的周敦颐。此时，周敦颐年纪尚轻，任南安军司理参军，还没有名气。程珣与周敦颐相识后，对周敦颐的学识大加赞赏。这样，程珣便命程颢、程颐受学于周敦颐。当时程颢年仅十五六岁。

据有关资料记载，周敦颐教授二程近一年的时间。教授的内容是“孔颜乐处”，让二程寻求孔子、颜回之所乐，即安贫乐道之理。当时，周敦颐的学说尚未定型，故而，周敦颐所授还不是其学说的根本旨趣问题，而是一些学圣人、做圣人的一般道理。

但也有资料说，当时，二程“从汝南周茂叔问学，穷性命之理，率性会道，体道成德，出处孔、孟，从容不勉”，已经学得相当深了。

程颢还有一个独特的条件，就是他有张载这样一个亲戚。张载是二程的表叔，长程颢十二岁。张载是“关学”的创始人。尽管关于“关学”与“洛学”之间的关系问题，即哪家形成在先的问题人们有不同的说法，但二程当时处于学习阶段，

张载已经成名，二程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张载较大的影响这一点，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。

为官政绩

仁宗嘉祐元年（1056），程颢二十五岁，学业有成，赴京应试。当时，程颢已经很有名望，京城诸生都自以为不及，“莫不登门拜访”。次年，程颢进士及第，同年中有张载、苏轼、苏辙、曾巩等。

嘉祐三年，程颢第一次授官，出任京兆府鄠县（今陕西户县北）主簿。在鄠县担任了几年主簿后，程颢奉调江宁府上元县主簿。程颢任上元县主簿不久，该县县令因事罢职，程颢遂代行县令之职。英宗治平元年（1064），程颢出任泽州晋城县令。程颢在鄠县、上元县和晋城等地为官，政绩显著，有了一些名气。有人想推荐程颢到朝廷做官，私下征求他的意见，问他想到哪个部门做什么官。程颢回答说：“荐士当以才之所堪，不当问所欲。”

治平四年，程颢进京，任著作佐郎。当年英宗皇帝崩，神宗即位。神宗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程颢三十七岁。由当时的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，程颢被擢升为太子中允，权监察御史里行。这一年，程颢上了《论王霸札子》《论君道》《论十事札子》《论养贤札子》等疏奏。《论王霸札子》阐述王道和霸道的区别，提出“诚心而王则王矣，假之而霸则霸矣”的主张。《论君道》提出“君志先定”的论点，说“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”。《论十事札子》中，列师傅、六官、经界、乡党、贡士、兵役、民食、四民、山泽、分数十事，提出对十事“三代

之治不可改，先王之法不可变”的论点。《论养贤札子》说的是得贤才治理天下的道理。

当年，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，推行新法。程颢对新法有非议，曾上《谏新法疏》。疏上，神宗没有理睬。程颢又上《再上疏》，要求停止新法，仍没有回应。程颢遂“合门待罪”，不视职事。这样，程颢被调为京西路同提点刑狱。程颢不就，改任金书镇宁军节度判官。随后，程颢到澶州上任。

不久，程颢以侍奉父亲，与家人团聚为由，向朝廷提出辞职回洛阳的请求。他的要求获准。随后，程颢在洛阳闲居一年多。在这段时间内，程颢和文彦博、司马光、吕公著、邵雍等人关系密切，彼此之间常有诗文酬答。

后来，程颢被授予太常丞之职。这是一个掌管宗庙礼仪的职务。直到这时，程颢依然没有放弃对王安石新法的反对立场，又一次上疏神宗，要求取消新法。对此，神宗甚为不满，又将程颢太常丞之职罢掉，调放知扶沟县令。

不久，免扶沟县令，程颢奉命调任奉议郎。数月之后，奉议郎之职又被罢免。这样，程颢请求在洛阳附近安排一个职务，理由是父亲年纪大了，自己要尽人子之责。之后，被任命为汝州酒官。从此，他长期住在洛阳，广揽门徒，从事讲学活动。

元丰八年（1085），宋神宗死，程颢心情沉痛。他曾批评新法，触犯当权者，与他政见相同的同事几乎都遭贬谪，唯独他还被神宗保住官位，于此他仍认为神宗对他有“知遇之恩”，所以深切怀念神宗，哭泣不已。

神宗去世，哲宗赵煦即位。当时，哲宗才十二岁，朝政大

权落于太皇太后高氏（宋英宗皇后）手中。高氏不赞成王安石变法，对新党亦无好感。此前因神宗在位，她不便说三道四。神宗死后，她垂帘听政，重新启用司马光、吕公著等旧臣。司马光上台后，排除新党人物，几乎废除了所有的变法。

这一重大变化是程颢梦寐以求的。然而，对司马光的极端举动，程颢却不以为然。他认为，新党变法固然有误，但也不能对他们一律采取排斥的态度。程颢内心深处对于新党人物是很反感的，他认为这些人皆为嗜利之徒，但他又认为这些人中不乏办事干练之才。对这些人，处理一定要讲究方式，绝不能鲁莽行事。程颢的基本思路是将新党中的可用之才仍然留在朝中，量才录用。同时，要用传统的政治主张去影响他们，由这些人去改变新法。否则，逞一时之快，把新党人物统统打倒，很容易酿成反复迫害、祸根四伏的局面，总有一天会出现唐朝牛、李党争那样的悲剧。

对于新法的处理，程颢也有看法。他认为，新法虽然需要废除，但对其中某些具体条款也要进行具体分析，不可一概废止。司马光没有采纳程颢的意见，但是他对程颢本人却十分器重。他一上台，立即想到了时为汝州酒官的程颢，擢升为宗正寺丞。只是，当时程颢已重病缠身，当年六月十五日即与世长辞。

学术活动

程颢年轻时就开始了学术活动。二十五岁时进京应试，他收了第一个学生——刘立之。当时刘立之七岁，后从学程颢三十年，登进士第。

二十七岁时，程颢与张载讨论人性问题，作《答横渠张子厚先生定性书》，这成为二程理学的重要文献。神宗熙宁五年（1072），二程的父亲程珦归朝，程颢遂在洛阳谋了一个闲职，一面侍奉父亲，一面讲学。他的学生刘立之记述说：“先生以亲老，求为闲官，居洛阳殆十余年，与弟伊川先生讲学于家……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，有不远千里而至者。”

元丰二年（1079），吕大临来洛阳从学于程颢，他记述了程颢之所教：（1）“理”与“天理”：“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，故推之四海而准。”（2）“识仁”：“学者需先识仁。仁者，浑然与物同体。”（3）人性论：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”；“事有善与恶，皆天理也”。

元丰四年，李端伯学于二程。程颢提出：“道即性也。若道外寻性，性外寻道，便不是。”

元丰五年，刘绚来洛阳从学于程颢，记述了程颢讲授的重要思想：“天地万物之理，无独必有对，皆自然而然，非有安排也”；“万物莫不有对，一阴一阳，一善一恶，阳长则阴消，善增则恶减”。

元丰六年，刘绚记述了当时程颢关于诸子学派的评论。程颢说：“杨、墨之害，甚于申、韩；佛、老之害，甚于杨、墨。杨氏为我，疑于仁。墨氏兼爱，疑于义。申、韩则浅陋易见。故孟子只辟杨、墨，为其惑世之甚也。佛、老其言近理，又非杨、墨之比，此所以害尤甚。杨、墨之害，亦经孟子辟之，所以廓如也。”

从熙宁四年（1071）到元丰八年（1085）的十四年当中，程颢的主要精力从政治方面转向教育和学术方面。他以洛阳为

基地，一方面对儒学进行总结、探讨、钻研、创新，另一方面教书育人，在长期的坚持中，开创了自己的学说。

元丰八年，程颢逝世，享年五十四岁。死后，赐纯公谥号，封河南伯。著名学者文彦博题其墓曰“明道先生”。他的弟弟程颐撰《明道先生墓表》，其中说，“生千四百年之后，得不传之学于遗经，志将以斯道觉斯民”，“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，为功大矣”。

二、程颐生平

求学

程颐比程颢小一岁，生于仁宗道明二年（1033）。与哥哥一样，程颐自幼聪慧，有教养，“幼有高识，非礼勿动”。十四岁时学于周敦颐。《河南程氏遗书》中说，二程兄弟“受学于周茂叔，每令寻仲尼、颜子乐处，所乐何事”。程颐自己说：“某自十七八读《论语》，当时已晓文义，读之愈久，但觉意味深长。”

英宗治平三年（1066），吕公著上奏推举程颐，说他“洞明经术，通古今治乱之要，实有经世济物之才”，“使在朝廷，必有国器”。而程颐“自以为学不足，不愿仕也”。

仕途坎坷

程颐没有出仕之前，对当时的政治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。他很注意观察社会，敏锐地察觉到了当时潜伏的巨大社会危机。皇祐二年（1050），十八岁的程颐以布衣身份上疏宋仁

宗，说：“方今之势，诚何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，火未及然，因谓之安者乎？”疏中他向仁宗皇帝详细分析了国家所面临的严重形势，请求仁宗励精图治，改革弊政，同时希望仁宗能对他破格召对，给他以尽情陈述己见的机会。这份疏凝聚了程颐对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真知灼见，大胆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，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。很难想象这份疏出于一位涉世未深的青年之手。这一方面显示了程颐高度敏感的政治眼光，同时也反映了他热切要求参与政治的迫切心情。

程颐上疏后，没有得到仁宗的批复，无法“罄陈所学”，只好再进太学重新学习。当时，主持太学的是著名学者胡瑗。有一天，胡瑗以“颜子所好何学”为题，科考诸太学生。程颐虽进太学不久，但在受教于周敦颐时，周敦颐曾让他与哥哥“寻仲尼、颜子乐处，所乐何事”。这样，程颐从容应答，分析了心、性、情三者之间的关系，提出了觉者“性其情”，愚者“情其性”的论点。胡瑗看到程颐答卷后“大惊异之”，赞赏备至，立即召见程颐，“处以学职”。

宋神宗在位的十七年中，程颐一直没有出仕。这一状况可能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：一是神宗在位时，起用的基本上是新党人物，为了和新党划清界限，程颐本人耻于与这些人为伍；另外是鉴于程颐的基本立场，新党对他顾忌甚深，将他排斥在政权之外。

司马光上台后，立即请程颐出仕，遂与吕公著联名推荐。元丰八年十一月，授程颐汝州团练推官，充西京国子监教授。这时，程颐已五十三岁。当时哲宗只有十二岁，为了预防皇帝长大之后走神宗的老路，旧党把教育哲宗的重任交给了程颐。

元祐元年（1086）闰二月，程颐至京师任秘书省校书郎，随即召对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。八月，又差兼判登闻鼓院。“崇政殿说书”这一职务并无实权，但是充任小皇帝的老师这一点，职责却非常之重。同时，能够天天与皇上见面，这一点也让许多人十分羡慕。

就程颐本人而言，三十五年前，他想见宋仁宗一面而不可得，现在俨然为帝王之师，这就已经令他兴奋不已了。

不过，在兴奋之余，程颐心中泛起一丝愁绪，教皇帝读书虽然荣耀无比，但毕竟不是轻松之事。为了做好这项工作，他在就任崇政殿说书之职以前，连上三道《论经筵札子》。疏中，他提出了几点设想。如果太皇太后能够同意他的几点设想，那么，他就责无旁贷，立即负起经筵之事，否则难以从命。程颐的设想是：（1）皇上年幼，以辅养为急，先生应陪侍皇上陈说道义，熏陶德性。（2）皇上的左右应选老成淳厚之人，皇上小有过失，他们可以随时规谏。同时，他们应该把皇上在宫中的行止告诉讲官，以便讲官讲书时有针对性地向皇上进行讲解。（3）请令讲官坐讲，以便培养皇上尊儒重道之心，寅畏祗惧之德。高氏答应了程颐的要求，程颐遂就任崇政殿说书。而实际上，程颐的第二项要求几乎全部落空，没有什么人向他报告皇帝的行止，这令程颐异常失望。

程颐为人本来就端肃出名，现在更加不苟言笑。而他的这些个性特征，又引起了小皇帝的不快。有一次，程颐正在为哲宗讲经，小皇帝听得有点不耐烦，便起身折了一枝柳条。对此，程颐立即板起面孔，对哲宗加以训教，说：“方春之时，不可无故摧折。”程颐这话说得不错，但对于小孩来说，方式

未免欠妥，结果弄得小皇帝很不开心。

按照宋时惯例，暑伏期间皇帝暂时罢读。这主要是为皇上的健康着想。但对此，程颐颇不以为然。他认为，皇帝的健康是应加以注意，然而却不必罢读，讲书断不得，而应“移就一宽凉处”进行。这件事又弄得他和皇上双方不快——宫里没有人听他的，他感到不快；皇上知道大热的天先生还让他读书，也感到不满。

在此期间，程颐参与了修改太学章程的任务。程颐企图用新儒学即理学思想全面改造太学。这样，他提出的修改意见便有全盘否定原章程之嫌，这使原来主持太学的官员感到十分难堪。时为礼部尚书的胡宗愈不但以祖宗之法不可变为由，坚持一切照旧，而且有意将程颐驱逐出朝廷。

事情发展到宋哲宗疮疹事件时，已经变得无可挽回。有一次，轮到程颐为哲宗讲书，他得知哲宗患疮疹，已有好几天没有上朝问政。这时，程颐的牛脾气来了，他首先问责于宰臣：上不御殿，知否？曰：不知。程颐接着发挥：二圣临朝，上不御殿，太皇太后不当独坐。且人主有疾，而大臣不知，可乎？次日，宰臣以程颐之言奏请问疾，这无异于火上浇油。程颐的话不但太皇太后知道了，而且群臣也知道了，这首先引发众怒。谏议大夫孔文仲第一个发难，对程颐提出弹劾。

这时，程颐平常的一些言论和观点也被翻腾了出来。程颐平生不喜文学之士，认为诗词写得再多、再好，也无益于治邦安国，而那些所谓的妙词佳句，是一些没有实用价值的“闲言语”。他曾说：“某素不作诗，亦非是禁止不作，但不欲为此闲言语，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，如云‘穿花蛱蝶深深见，点水

蜻蜓款款飞’，如此闲言语，道出做甚？某所以不常作诗。”

程颐对文学和文学之士的这种态度，曾引起某些文人的不快，这其中就有蜀党领袖苏轼。苏轼一向恃才傲物，即使像王安石这样的文学大家，他也不放在眼里，时有讥评之语。而对于程颐这样言必称孔孟，文章欠文采，行为又迂腐的道学家，哪能瞧得起？新党执政期间，双方都反对新党，彼此的分歧被掩盖。新党失势，原先的对手已不复存在，彼此便对立加剧。

元祐元年（1086），苏轼上疏参与弹劾程颐，在奏状中公然说：“臣奏疾程颐之奸，未尝假以辞色。”其厌恶之情溢于言表。太皇太后对程颐已经大为不快，加上大臣纷纷上疏，要求将程颐逐出朝廷，程颐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。次年八月，程颐被赶出京师，命回洛阳为勾西京国子监，这相当于太学分校的管理官员。这次被贬，出乎程颐的意料。他不想赴西京国子监就职，曾几次上疏，要求还归田里，但他的请求最终都未获准，他只好勉强赴洛阳就职。

元祐五年五月，程颐的父亲程珦去世。程颐以父忧去官。元祐七年，程颐服丧期满，朝廷中曾打算让程颐回京。这时，又是苏轼出面上奏，说程颐进京，“恐不肯靖”。结果，授程颐判西京国子监。四月，程颐接到官诰，遂寄放河南府，上疏辞职，但未获准许，只好勉强就职。

元祐八年，太皇太后去世，旧派失去了政治靠山。新党对宋哲宗施加影响，以至于宋哲宗亲政后，表示要继承宋神宗的事业，改元绍圣。新党重新上台。新党援引旧党之例，把旧党纷纷赶下台，并且也不准他们的子弟入仕。有人弹劾程颐是司马光等人推荐得名，应列为奸党。于是程颐被削职为民，放归